

“轻骑兵”的姿态与力量

——关于短篇军旅报告文学的对话

■ 佟鑫 徐剑

谈艺现象

深度对话,解读现象

佟鑫:在中国当代文坛,短篇军旅报告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佳作涌现、影响深远;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短篇军旅报告文学创作充分表达了礼赞英雄、讴歌祖国的情感,并以“轻骑兵”的姿态书写现实、创新表达。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新任会长、著名军旅报告文学作家,您心目中有没有印象深刻、对您影响大的短篇军旅报告文学作品?

徐剑:我们的前辈作家给中国军旅报告文学留下了很多佳作。短篇军旅报告文学创作,我觉得可以一直回溯到延安时期组织编写的《红军长征记》。1936年6月,斯诺秘密访问陕甘宁边区。为了扩大红军的国际影响,毛泽东号召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同志都来写长征纪事,这些文字后来集结成《红军长征记》。将帅们用口述、笔录的方式来自己亲历过的长征,留下了较早的一批红色题材短篇军旅报告文学作品。此后,中国的短篇军旅报告文学流从未中断过。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巍巍从前线采访归来后所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了不朽的经典之作,鼓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篇作品和后来徐迟先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是军事的,一个是科学的,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的“双子星”。

进入和平年代,也出现了不少好的短篇军旅报告文学作品,比如吕兴巨写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这篇作品实际上促成了后来的话剧、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诞生。这使得“南京路上好八连”成了那个时代的偶像,成了人民军队在和平年代里的经典写照。

佟鑫:短篇军旅报告文学有着辉煌的过往,发展到今天依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一方面与读者和时代的需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它自身的艺术魅力有关。在您看来,短篇军旅报告文学有怎样的文体优势?

徐剑:从某种意义上说,短篇军旅报告文学,诞生于阵地,诞生于硝烟弥漫的坑道,诞生于一场战斗的前夜,抑或是大战落幕之后,人们坐在篝火前讲故事,诉说战争的成败与始末。然后,即刻把它记录下来,以短小、简要、快捷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就像美术写生中的速写一样,属于战地文学速写,讲求一个“快”字。用中国传统文学语言中那种简洁凝练的笔法,寥寥几笔,神韵兼具,留白干净,短小精悍。其实,按照这个标准,甚至《谁是最可爱的人》《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两篇作品都有点儿长了。我很喜欢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这部作品堪称世界级的短篇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这种报告文学是电报式的文学,是站着写就的。有时就是记录一个战争场景,一个片段,一个人。巴别尔的笔触,既有前方又有后方,既有军人又有百姓,甚至就在写一匹马、一只战时村庄中的白鹅,叙事节奏棒极了。我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短篇军旅报告文学的文体优势,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轻骑兵”,是匕首和短剑。这样的精短而写真的文字留存下来,就很可能成为英雄精神的剪影。同样的,我也很喜欢司马迁。司马迁写战争场面,比如垓下之战、鸿门宴、荆轲刺秦王,都是寥寥数笔,白描式的写法,但读起来,给人精彩绝伦之感。

短篇军旅报告文学的文体优势,一言以蔽之,就是“轻骑兵”,短平快;就是又短又快又好又优,能打动、鼓舞士气、触动人们的精神,令人过目不忘。如果让我再说一个作家的话,那就是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这也是一部十分优秀的短篇报告文学集,尤其是他笔下的战争描写,值得我们反复阅读。

佟鑫:进入新时代,军旅生活正在发生全方位的深刻变化,短篇军旅报告文学创作如何书写新的军旅经验、塑造新的军人形象,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徐剑:当前,书写军旅生活、塑造军人形象,一定要有前沿意识、未来眼光。作家必须了解战争,熟悉兵器,具备认知战争态势和感知战场变化的能力,这对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我看来,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得兼具多个“半”。首先,你应该是半个科技专家。对科技的奥秘,对高科技武器的发展趋势应该比较熟悉。不懂得空天一体化作战,不懂得卫星,不懂得网络,不懂得情报,不懂得外层空间,那你肯定把握不了未来的战争,这时作家的眼睛就是“瞎”的,就会有“文学雷达”的盲区。

其次,你还必须是半个军事家。所谓的半个军事家,就是要了解战争历史,具有一种全局性、世界性的军事眼光。知道人类战争已经发展到了什么阶段,遇到什么门槛,跨过这个门槛,人类又将面临什么?毕竟,未来战争一定是复杂诡谲的,让人难以预料和把握。

再次,你必须是半个哲学家,具有哲学家的襟怀和思想。哲学家思考终极问题,战争哲学亦然,要从人类、世界、文明的高度思考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优秀的作品,要绽放作家的思想光芒。

尤为重要的一点,你还须是一个知兵之人。要与现在的年轻一代官兵同呼吸、共命运,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成长和受教育背景、从军经历,这样才能塑造好、写好当代军人。此外,作家的风范和情怀也决定着作品的高度,那就是要自觉地书写军人的使命、尊严、荣誉、牺牲、爱情,写好人类共通的情感和精神,特别是对军人勇敢刚毅的英雄气质、对军人的尊严与荣誉有着深深的大爱。如果你不从事这些方面下功夫,不从这些方面去深入挖掘,那么你的作品就难以称得上是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具有历史总体性的叙事。

佟鑫:文学作品在追求深度的同时必然对作品的篇幅和分量有一定要求。短篇军旅报告文学以短小精悍见长,该如何解决篇幅与容量、深度之间的矛盾?

徐剑:大多数一线的报告文学作家,也包括我在内,都把精力和重点放在了长篇军旅报告文学上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短篇军旅报告文学创作。

有时一个短篇报告文学就像一首诗,短到有了诗意的境界,短到有了情感的浓度,短到有了哲学的高度。那么短,就可以称其为长。短到了像杜甫写“三吏”“三别”的篇幅,那么就是史诗。所以我觉得史诗和速写的关系是辩证的。长的未必

就是重的,短的未必就是轻的。关键在于写的题材是不是把准了一支高科技军队迈向辉煌的历史脉搏,是不是按到了现代战争的制胜穴位上,是不是写出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新形象、新气质。

短篇军旅报告文学可以就写一个人、几个场面,以小见大,依然可以把一场战争记录下来,把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气神写出来。要想写好短篇军旅报告文学,不要拘泥于一个事件、一个工程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写人。看似平凡普通的士兵,其实恰恰是你真正可以大书特书的对象。他们的情感、心理、精神世界,蕴含着深的、大的、重的文学元素。

佟鑫:重大题材是报告文学关注的焦点,似乎必须以长篇报告文学的体量来书写和表达,那么短篇报告文学该如何直面和回应重大题材呢?

徐剑:近年来,军队的大事件有很多,很多高科技兵器,甚至是国之重器纷纷亮相,非常引人注目。作为一个有着40多年军旅生涯的老兵,在我视野里那些堪称重大的事件就更多了,其中亲历的事件就有不少。如何写好重大题材呢,分寸感是必要的前提。你所面对的题材是重大的,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重写重、以重写重。侧面迂回,撕开小口子切入,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和未来徐迟先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是军事的,一个是科学的,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的“双子星”。

这种平常心,首先就是要回归文学的本体。把那些重大题材当作一件平常之事处理,闲庭信步,以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倘以重举重,把浑身的力量都拿出来写,反而可能写不好。第二点,写重大题材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俯瞰的视角,而不是一种仰视的眼光。俯瞰就是要站到国家、民族、时代甚至是人类命运的高点上,来看这支军队,看这件事,看这些将领,看这些士兵,以全局性的视角来书写这个重大的工程。因此,一定要在哲学思辨的层面占据先机。另外,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只有在历史、过去与未来的比较中来综合衡量,才能有新的发现、新的挖掘,才会有更高、更新的立意与主题。我写过很多重大题材,篇幅也有很短的。比如《新李将军列传》,比如写张富清的《永远的军姿》,还有那些写“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作品,篇幅都很短。我就是把他们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当作自己的父辈来写,从容、亲切地走进他们的生命和精神。

尤其要做好充分的案头准备,在采访中注重挖掘那些精彩独特、生动鲜活的细节,只要有几个漂亮出彩的细节,往往就可以把一个重大题材的事件、人物写得自然流畅、入木三分。

佟鑫:文学性是报告文学老生常谈的话题,您觉得短篇军旅报告文学该如何更好地凸显其文学性。

徐剑:短篇报告文学入门的门槛看似

似很低,但是进去以后的台阶其实是很高的。短篇报告文学真正写得好的大师级作家,其实屈指可数。因为这要求作家必须具备思想的、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甚至是科技的素质。

有的作家写短篇军旅报告文学,常常认为只要抓到了一个好题材,写的是时代楷模,是有影响的科技专家、优秀军官和士兵,就成功了一大半,其实不然。文学和报告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如果让我来分,应是三分报告,七分文学,甚至是两分报告,八分文学。报告就是一个线索、一个平台、一个背景,而真正要把一个人物写好,是需要调动多种文学手段来呈现的。

要想写好,提升短篇军旅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我觉得几个忌讳的地方值得注意。第一,不能写成表扬稿。不能只写辉煌,只写过五关斩六将,而未注意这个人在过五关中、在走向辉煌的过程中,是否曾遭遇挫败。他会不会担心、紧张、恐惧,甚至会不会气馁、灰心、胆怯。这些人性深层复杂的地方,才是文学需要关注的重点。第二,不要写成记事簿。我看过很多短篇军旅报告文学作品,仅仅是写了一个过程、一个流程,在这个大致的轮廓里没有能立得住的人。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只有云过,没有雨下。没有精彩的故事,没有值得回味的细节,没有令人触动的细节,作品自然就显得十分空洞。

具体来讲,文学性的提升需要在写作中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作品的结构。越是短篇,越要讲究结构。有了精致的结构,作品自然就精彩了。二是作品的切入点。切入的口子一定要小,切得要巧,不要泛泛而写。三是思想的光芒。不管写事还是写人,作家的思想一定是独特的、新颖的、深邃的,一定要有哲学与历史的眼光。要写他人之未书,写他人之未想,写他人之未语。

我有一个自己的体会,要想写出一部精致、好看的短篇军旅报告文学作品,除了前面讲的结构、叙事、视角之外,不妨试试跨文体写作。换言之,就是你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所有的文学叙事方式和要素皆可以融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最后一点就是语言问题。报告文学的语言应该是文学的、诗性的、散文化的。这些因素都具备了,文学的品相自然就不会差。



长征

第 5474 期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大概七八年前,我开始了长篇小说《苏州河》(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的构思。这个酝酿了多年的故事,讲的是一个警察,在1949年新旧交替之际,所经历的巨大人生变故。我对这个有几分古典、苍凉、凄美的故事情有独钟。写警察、写英雄是我深藏心底里的一个梦。

他姓陈,叫宝山,出身沪上的警察世家,住在苏州河边。作为一名刑侦处的警察,他的生活在警察局,家中还有案发现场三点一线中度过。在小说里,他一直在破案的过程中,见证着国家发生的沧桑巨变。直到上海解放,他的警察理想,像升在空中的一道光,照亮了他斑驳却正义的人生。

我曾在武警部队服役。假若时光回到1949年,那时候的公安大部分是从部队转过来的。如果你看过老电影《上海》,就能大概知道解放上海时的场面。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警察局随即被接管。在那个交接的时期,教育、电力、电台、工厂、航运,什么都需要接管。上海解放时,公安局留用了百分之八十的旧警察。陈宝山业务如此精尖,仍然没有被留用,那是因为在有人暗中作梗。这个人叫张胜利,是公安局的一个干部。而他的真实身份是暗藏的特务。此外,他还是宝山养父母的亲生儿子张仁贵。在张胜利看来,一个推理专家的存在,会妨碍他更深的潜伏。刚刚解放的上海,公安局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反特。

我真希望也是在那时候当的兵,能穿着解放军的军服,哪怕只在公安局门口站岗,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如果我抬起头,天空是比蓝更深的蓝。

二

我还是想说这名叫“苏州”的河。我特别愿意对一些事物发呆,比如窗口的黑夜,又比如一棵安静的树、一汪忧伤的湖水、一截老去的城墙,空旷得让人发慌的露台,或者是一条叫苏州的河。

曾经我对外白渡桥和提篮桥,莫名地感兴趣。许多年前的一个冬夜,我出生于故乡诸暨的一座叫枫江的桥上。听人说,还没到医院,我就在父亲推着母亲匆忙前行的板车上出生了。我特别喜欢在桥上看风景,也曾骑着脚踏车去过外白渡桥,站在桥上想象着各种人生。在我的小说《醒来》中,就详细写到了苏门站在桥上,陈开来给她拍下了无数照片的场景。我喜欢外白渡桥的钢构架,那硬朗的桥身,立在柔软的水上,相得益彰。当然,我也曾在提篮桥上逗留。在遥远的少年时代,我曾经无数次从提篮桥上走过。

上海,我的半个故乡,深深融进了我的血液。

我曾经被一张旧照片深深吸引。在解放上海战役中,苏州河沿岸战事胶着。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南京路上亲眼解放军睡在人行道上,发出由衷赞叹并记录在其战地笔记中:“这是一个感人的画面,这些年轻人日夜行军战斗,一定累坏了。苏州河畔的枪声,也没有

英雄情结唤醒尘封记忆

■ 海 飞

吵醒他们,他们睡得很熟。”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他们如此疲惫,说不定身上还带着枪伤。在新生的世界来临以前,躺在地上,其实是光芒四射的赤子。

我不禁猜测,他们的人生会是怎样?这些士兵中会不会有我的诸暨老乡?

三

站在外白渡桥上,你可以看到驳船拖着沉重的船身,像一条黑色的蜈蚣一样,蜿蜒向前。我知道驳船有驳船的方向,河流也有河流的方向,如同我们不规则的人生。苏州河会通往苏州,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也能通往诸暨。黄浦江和苏州河,在外白渡桥附近交汇,江河因此而奔腾。

奔腾是生命的活力,是不惧过往和将来的人生。

在苏州河的波光里,河面水汽氤氲,像一张银幕,你能看到数不清的人生,他们像海市蜃楼一样的呈现。《苏州河》里的人物仿佛也在银幕上朝我点点头,挥挥手。苏州河已不是一条河,她是一面镜子,照得见我们的过去。

谨以此小说,献给那些为了迎接上海的黎明而无声暗战的共产党员,献给心怀英雄理想的警察陈宝山,给我们普通而瑰丽,如烟一般绽放的人生。

那些英雄情结和珍贵记忆,都倒映在苏州河的波光里。

激情燃烧岁月中的思辨与理想

■ 黎 萍

叠起来,避免了按照时间顺序铺叙所带来的冗长感。同时,书信体天然的真实感也嵌入了小说之中,拉近了读者与写作者之间的距离。

书信写作的形式,无限地贴近与放大了人物思想变化与内心的波澜起伏。不过,书信体也容易造成小说情节平淡。《时代三部曲:山河人间》则尽量回避这一点。小说一方面运用大量的生动细节,拓宽了书信的容量;另一方面,还借助人物思想认识上的变化来推动故事发展,让故事更加跌宕起伏。例如,对于水利工程大建设,当地群众从一开始认为此举破坏当地风水,转变为全力支持。一次思想的变化,往往需要蓄积强大的力量才能突破故有的经验与认识。而这种强大的力量从何而来?陈家桥十分敏锐,他抓住了人物思想的拐点,让小说在人物观点的碰撞中蕴蓄前进的力量。也正因为这种观点的碰撞,文本的深层意义才得以浮现出来。

小说女主人公义兰负责水利建设的宣传工作,男主角志刚则被安排到工地与劳动群众一道干活。恰好,志刚的大哥程志茂是水利工程大建设中涌现出的劳模。因此,志刚在信中给义兰提供了许多关于大哥和水利工程建设的第一手资料,义兰也就报道了程志茂的英雄故事。义兰是高干子女,志刚是农民的儿子。义兰从小在父亲的期盼中成长,对于现实生活,有着种种的隔膜与陌生。而志刚则更为关心自己的前途和生活,视野与眼光不及义兰,偶尔还会出现消极情绪。身份与地位的悬殊让两人在许多问题上不知不觉地站在了对立面。面对义兰对大哥的宣传,志刚更多的是从亲人的角度去考虑,他经常强调大哥只是一个平凡人,希望大哥爱惜自己的身体;而义兰则号召其他人以程志茂为榜样,同时希望这样的宣传鼓励能够让程志茂走得更远。

表面上看,这是一对青年男女书信的交流,从更深层次来看,每一次信件

的往来,都是一次理性与感性之间的辩论。此外,小说无处不在释放与呈现面对现实问题而跳脱出的各种不同观点。在观点与观点的碰撞中,小说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纠结、碰撞的场域。

陈家桥在写作过程中,尤为关注那些在团结协作的主旋律之下出现的小插曲与各式复调。在宏大的时代主题之下,小说的人物都有着各自的想法,这些看法有的边缘,有的游离,有的摇摆不定……在大会战过程中,小说全方位展现了各方在工作方法、用人问题、物资安排等方面的意见。事件的参与者构成一次争辩,通信人义兰和志刚再构成一次争辩。这种复调式的争辩让文本渐次逼近历史真实。

那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物资奇缺,许多大型工程建设只能依靠人力完成。但是,人们把苦难当作动力,不为名利,毫无私心,把献身国家建设事业视为无上荣光。那是一个多么纯粹的年代!

《时代三部曲:山河人间》充满着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陈家桥用书信体的写作方式,搭建起一个巨大的、沉浸式的历史空间,真实的细节连续、交错,使得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小说对人物思想轨迹的挖掘达到一定的深度,全景式再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风貌,堪称一部记录父辈们创业过程的精神史诗。



清风和鸣(中国画)

丁 鼎作